



为何必须原址原位保护？
守护天津历史层积的真实性

“在普通人眼里，这道城墙可能只是一段‘灰溜溜’的土坡，但它是天津建卫620余年的重要物证，它的标高信息远比‘颜值’重要得多。”站在地下展厅的坡道上，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所属地铁集团项目负责人牛连超指着土层断面解释道。

2017年，在地铁4号线东南角站施工过程中，明清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被发现，作为建设单位的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秉持高度的文物保护意识，第一时间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天津市文物局。

地铁建设作为重要的民心工程，肩负着改善城市交通、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任；而文物保护则是守护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文化的关键使命。当二者“狭路相逢”，如何在推进建设的同时，精心守护珍贵的历史遗迹，实现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和谐共赢，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实城墙遗址并不鲜见，全国各地也有不少古城墙博物馆，它们身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呢？由项目工程建设方、设计团队和文物保护专家组成的团队奔赴全国“取经”。“在考察的几个项目中，和我们情况最接近的是西安和北京的两处遗址。”牛连超介绍说，“西安地铁6号线鼓楼站的元代水井被发现后，为了不影响地铁建设，被整体迁移至地铁通道旁的一处位置。而北京通州的金城城墙遗址，则采用了切割复建的方式——在建设前将整体城墙切割移走，待工程完工后再送回原址复建。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会造成遗址位置和标高的变化，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原址原位保护。”

天津建城史可追溯至明永乐二年（1404年）12月23日，明成祖朱棣在此地渡河南下争夺皇位，取“天子津渡”之意赐名“天津”，并设军事建制“天津卫”。与北京、西安等古都相比，天津的历史虽然并不算悠久，却是中国唯一有明确建城时间记载的城市，而此处城墙遗址正是城市起源的实物证明。“它的基础从1404年建城时就没动过，是天津‘从无到有’的实物见证。”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工程师李珂介绍，考古发现显示，城墙在明清时期经历过改造——明代为防御外敌，城墙更加“瘦高”；到了清代因防洪需求，改建成了“矮宽”形，这些变化在遗址的土层结构中清晰可辨。更珍贵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天津城墙被拆除，地面遗存几乎消失，这处地下遗址成了唯一能触摸到的“城市原点”。

“这处城墙遗址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李珂解释道，“特别是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枕木遗迹，这正是天津1906年开通的全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老城环城白牌电车）的遗存。这些枕木见证了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起步。”

虽然城墙遗址挪移复建在操作上更为简便，但是基于对城墙遗址的历史价值认知，项目团队最终还是选择了原址原位保护的建设方案。在李珂看来，这处遗址的价值更在于其展现的城市发展“连续性”——古代城墙、近代有轨电车与现代地铁在地下8米处形成“时空叠印”，绘就了一部立体的城市发展史诗，更构成了天津从“卫城”向“现代都市”演进的历史剖面，一旦移动，这种历史层积的真实性将永远消失。

当然，原址原位保护也给工程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当时全国尚无地铁建

探班全国首个原址原位保护地下城墙展厅

在地铁里，与620年城墙遗址对话

记者 田莹



文化从来不是蛮干，得靠硬核技术。”牛连超感慨，从方钢顶进到弹簧支座安装，每一步都是在挑战极限，而这套“天津方案”，或许能为全国类似工程提供一个珍贵的范本。

从交通站到文化枢纽
打造轨道上的津味体验

天津地铁东南角站的展厅里，80米长的坡道如同一道时空隧道，从负二层站台延伸至负一层展厅，游客拾级而上时，仿佛从现代地铁穿梭回600余年前的天津卫。“坡道不仅解决了标高差，更藏着‘穿越’的巧思。”李珂介绍，展厅特意突出展示了城墙遗址的原始土层肌理，那些被重新描画的夯土层次，正等待研究者来解读。“作为设计者，我也期待着，这座地下展厅能成为研究天津历史的活标本，甚至能承载学术沙龙、城市生日庆典等活动，让更多人读懂城墙下的城市记忆。”李珂表示。

天津地铁东南角站周边已形成“古今交融、多维体验”的文旅消费生态圈。“设想一下，站内即逛‘地下博物馆’，出站步行5分钟可达古文化街，可听相声、体验非遗手作，‘打卡’耳朵眼炸糕等老字号。这条线，串起了天津的‘古今味’。”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蕴秀介绍，东南角站的文物展厅只是起点，天津地铁正以“一线一色一主题，一站一景一故事”的理念，打造“轨道文化生态圈”。

天津地铁多个站点通过特色主题设计，将交通功能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乐园道站以“桥文化”主题墙为载体，通过艺术装置立体化呈现解放桥、金汤桥等历史名桥的演变轨迹，勾勒出城市发展的脉络。西北角站创新性地构建相声文化展示空间，系统梳理曲艺发展史，并陈列早期相声名家的资料，生动表达天津地域文化。吴家窑站运用生活场景化陈列手法，在站厅设置年代感十足的展示橱窗，通过具有岁月感的老物件唤起集体记忆。文化中心站则以全景式油画《海河之春》为视觉焦点，画面将天津站、天开园等新老地标有机融合，展现城市三十年间的沧桑巨变。这些站点不只具有交通枢纽功能，也成为兼具教育意义与互动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游客提供深度感知城市历史文化的沉浸式空间。

“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扩音器’。”孙蕴秀表示。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已经围绕“坐地铁·游津城”主题，系统整合城市热门旅游地标，编印形成《朝朝暮暮烟火人间》文化手册，标注地铁站点和周边景点介绍，推动交通网络与文旅资源的深度联动。在数字化服务方面，地铁App中的“文化权益地图”，聚合沿线老字号商铺及文博场馆的专属福利，打造“乘地铁、逛津城、享福利”的服务体系。

疾驰的地铁不仅输送着络绎不绝的乘客，更成为流动的城市文化长廊，连接着津沽大地的过去与未来。

非遗薪传

刘頔 在时代潮流中传承文人制扇风骨

记者 张洁



一刀定乾坤
在制扇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记者：您如何与北派文人制扇技艺结缘的？
刘頔：这一技艺的开创者周与九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精篆刻、刻瓷、刻竹，尤其以扇骨雕刻闻名，作品精湛，曾开设“与九印社”。第二代传人我的父亲刘宇，酷爱书画雕刻，结识周与九先生，常向其请教制扇、刻扇技巧，后随周与九先生学习扇骨雕刻技艺，融汇中西艺术精髓。父亲退休前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酷爱文玩收藏，退休后在鼓楼创“三耕园”扇庄。

我最初从事雕塑，曾在天津美院进修，与教授合作创作城市雕塑，但自幼受父亲熏陶，也一直在学习制扇技术。我不仅传承本门技艺，更拓展现代折扇雕刻题材。不到三十岁时，我创作了首个扇子作品《知音弹琴》，灵感源自父亲常听的大鼓书，讲述俞伯牙因于期离世而摔琴的故事。我从事大型雕塑创作时，接触过不少相关技艺，但是以往做四五米的大型作品，如今转为

做小巧的扇刻，也要有个适应过程，过程颇为艰辛，不过艺术其实是相通的。父亲退休前，既以粉笔育人，又以毛笔绘丹青，晚年更是以刀代笔，将绘画与雕刻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父亲将扇庄命名为“三耕园”，这“三耕”意为手持粉笔、毛笔、刻刀耕耘，是我们家传的艺术精髓。从事制扇行业，绘画是基础。

记者：父亲对您有哪些影响？
刘頔：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尤其在艺术学习上，他要求极为严格。从小，他就督促我练习绘画，比如要求每天画够100张纸，但也因为父亲这种教育方式，让我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本功。父亲秉持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对待师长毕恭毕敬，也以此要求我，他既是严父又是良师。在技艺传授上，他注重基础训练，无论是素描还是国画，都要求我按部就班学习，一丝不苟，强调熟能生巧，没有捷径可走。他鼓励我带着问题去学，通过观察他的示范，自己去领悟，后来我明白，这种方式比死记硬背更加深刻有效。

就竹雕阴刻而言，竹材有横竖茎纹，要求雕刻者控刀能力强，运刀得流畅自如，一气呵成，刻出的线、面要利索，不能拖泥带水。我刚上手刻时，稍不注意就会把竹子的毛茬刻翻。此外，磨刀更是基础技艺的基础。成长过程中，父亲在适当的时机放手让我自主发展，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后来经商接触社会，他都从不过多干涉，完全让我自己去打拼。他创立“三耕园”时，也只是将平台留给我。他常说，基础已为我打下，未来的路如何走，成就高低，全凭我个人的造化和努力。我非常理解父亲的这种教育方式，他让我明白，真正的事需要不断打磨和摸索，自立自强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北派文人制扇有哪些独特之处？

刘頔：北派文人制扇的独特之处，在于注重扇子的实用性与文化气韵。北方扇子通常较为厚实，拿在手中有分量感，与南方扇子的精巧细腻形成鲜明对比。北派制扇讲究线条流畅、一气呵成，刀法稳准狠，拙中见巧，一刀定乾坤，不容反复雕琢。这种工艺虽看似简单粗犷，实则对技艺要求极高，稍有不慎便易显笨拙，而南方扇子则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在材料选择上，北派制扇也非常讲究。若选用竹子，必是三四年的箭竹，经盐水和花椒水煮制后破片阴干，数年后精选最佳部分制成玉竹扇子。至于木质扇子，则多选用老乌木、鸡翅木、紫檀等名贵木材，如今这些材料越发难得，我所用的料多来自老家具拆解，更添一份岁月沉淀的韵味。

在工艺上，北派制扇有着丰富多样的技艺展现。乌木上的掐丝镶嵌，需要凭借精湛手艺，用特制弧形刀在乌木上精心雕琢出花纹，一刀下去，让木头翻起，使银丝能卡进花纹中，靠木头自身弹性，使花纹与银丝紧密贴合，无需用胶，但这一过程极易出现材料报废，成功率很低。与传统工艺相比，现代工艺通过雕刻机铣槽后用胶粘银丝，这种方式虽然更便捷，但却少了传统工艺的精妙之感。

文人扇的内涵
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记者：您是如何深入理解文人扇中所体现的“文人风骨”，并将其融入自己的雕刻创作中？
刘頔：古人尤其是文人定制扇子时，常找匠人精心制作，达官贵人对扇子极为重视。折扇因其便携雅致，成为文人雅士的“怀袖雅物”，不仅功能性显著，更是身份的象征。扇子还是绝佳的文化

载体，集材料、雕刻、做工以及扇面的诗书画印等文化元素于一身，承载着深厚内涵，值得传承。

过去绘画分为宫廷派和文人派。这些绘画作品，实则是画家思想与情感的深刻载体，它们间接反映了画家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与情感，又或是寄托了富贵繁荣发展的美好寓意。文人的作品，往往蕴含着对社会现象的微妙反应。比如“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瓒，擅画山水和墨竹，他的画在元代备受文人追捧，以淡墨绘就，却显得厚重异常，技法高超。那淡淡的墨色之下，留下的不仅是画面，更是深邃的空间感，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空白的宁静与深远。

近年我做了一些复刻作品，这需要完全按照原图1:1复刻，极大锻炼了基本功。父亲给我图稿后，叮嘱我要了解原作者的生活年代、历史背景，把握文人风骨精神，不能在制作中将其遗失。我先从整体入手，只看轮廓线、镂空部分以及大致形状、花布局，把这些掌握好、分布妥，再逐步细化，深入叶片、花瓣、小叶茎等细节。古人对花的刻画有概括、总结与取舍，我也效仿学习。就这样，连画稿带制作，一件作品往往要数月才能完成。我在制作中秉持着尊重原作的态度，向先辈汲取技艺。

记者：这些年您在制扇中有哪些创新？在技艺上您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刘頔：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复制和还原诸多经典之作，比如《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所持的扇子。复刻时，需依照图中人物手持扇子的高度比例，推算出扇子的尺寸，经过多次拟画图纸，反复斟酌各个细节的长度、角度等，直至敲定最终图稿，最后进行制作。整个过程大概耗时半年。别看这只是一张画上的扇子，古人创作时极为严谨认真，而我们复刻出的扇子拿在手里恰到好处，